

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

神靈與祭祀

——中國傳統宗教綜論

詹鄞鑫 著



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

詹鄞鑫

著

神靈與祭祀

——中國傳統宗教論

江蘇古籍出版社

(苏)新登字006号

神灵与祭祀

——中国传统宗教综论

(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

编 者: 詹鄞鑫 著

出 版: 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发 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5.75 插页 4

199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39,000 印数: 1—2,000册

ISBN 7-80519-377-0/K·203

定 价: 9.8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古文献研究丛书》是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旨在反映我国当代部分学者研究我国重要古籍所取得的新成就。

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其整理研究工作也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贡献。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由于在各个时代反复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已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些古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个时代的学者又各自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带着各具特征的学术视野、观点与方法来进行再认识；所以，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虽然一再重复，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重复的工作在整体上却具有推陈出新、步步深入的特点，是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得到创造性传承的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进程。这样的进程显然在将来也要继续下去。

前些时候，围绕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论争，通过论争也取得越来越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定不移

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越是对外开放便越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熏陶能够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养成，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中，对于重要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些重要古籍事实上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们不但传承悠久，而且从古至今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站在自己的伟大时代，完全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原则，进一步认清这些古籍的本来面目，并更为科学地评估它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文献研究丛书》的作者，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青年学者。这些学者都受过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广的认识，并在各自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提高了关于中国古文献学的造诣；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也对各种外来的学说和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或吸收，因此具有在学术上反映时代特色并继往开来的潜力。但由于本丛书是属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项目，因此各书的内容仍以对古文献的考证为主而兼及其它论述。各书的研究形式并不一致，除多数为专书研究外，也有专题研究与论文集。但在学术质量方面则有统一的要求，即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学

术观点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广泛掌握实际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由于各书都以考证为主，因此所有作者不管在研究中吸取什么新的方法，都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朴学”的谨严作风，以实学为前提，对所有结论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戒浮言臆说，绝不故弄玄虚。至于这些要求在实践中究竟做得怎样，则敬祈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由于组稿有先后，交稿有迟速，所以本丛书采取分批出版的方式。现在，学术书刊出版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江苏古籍出版社却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做实事的原则，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优先安排，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保证出版工作高质量地完成。对江苏古籍出版社所作的一切努力，本丛书编委会谨表谢意。

《古文献研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

〈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 編・金開誠

副主編・安平秋

委 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安平秋 李解民 金開誠

高紀言 盛冬齡 張永鑑

湯敬昭 葛兆光 董洪利

前　　言

中国传统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全面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中国传统宗教的专著，至今似乎未见。撰写此书的目的，固然是我想在这块草莱之地上做一些拓荒工作，即试图从鬼神的观念和礼俗中探索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而初衷却是为了古典文献之阅读和研究的。

传统宗教和古典文献研究，原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课题。可是，当我想从语言方面研究先秦文献，特别是甲骨文献——这是目前唯一可靠的商代文献——的时候，就越来越感到，如果不了解古代宗教礼俗，就无法真正了解古代社会，自然也谈不上对古代文献的深入研究了。

古典文献研究，概而言之，可分为形式和内容两大方面。古文献的表现形式，如写本、抄本、印刷本、长卷式、册叶式等等，都还是纸书文献。广义的古文献除了纸书文献以外，还有简册文献、版牍文献、石刻文献、缣帛文献乃至器铭文献、甲骨文献等等。追究起来，其产生和发展几乎都与古代宗教信仰及其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李学勤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提醒我们注意：“甲骨本是占卜的遗留，而占卜作为一种数术，更是同那时的信仰分

不开的。金文也是一样，具有铭文的青铜器大多是用于祭享的礼器，随后又依照葬俗殉于墓内，亦为宗教信仰的反映。”如果扩大开来，其他文献形式何尝不是如此。

如纸书文献的前身——简册文献，最早出现时，似乎即是用于记载宗教制度或祭祀时报告神灵用的。出土的古代简册不早于战国，这只是由于竹简容易腐朽而无法长久保存于地下。《尚书·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证明夏商之际已有了记事的典册。甲骨文中有“册”和“典”字，其内容都与宗教活动有关。如殷代周祀先王先妣于每种祭祀开始举行之前，都有“工典”祭，表示先献简册向先祖报告。卜辞中又有“旧册”和“兹册”语，辞例如：

华燎，𠙴旧祫(册)用，三牢王受祐。(宁1.314)

𠙴兹祫用，燎华，卯一牛。(后上24.2)

辞中的“册”字加“示”旁，是因为它专用于祭祀。“旧册”指先代留下的典册，“兹册”则指当时记录的典册。上句卜辞意思说，燎祭华岳神，按旧典使用三牢能使王受到神祐；下句说，按时典杀一牛燎祭华岳神。甲骨文关于“册”的内容，大抵如此，很能反映典册在宗教活动方面的意义。

此外，本世纪发现的战国秦汉帛书，也与古代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如1942年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楚帛书，四周绘有四时十二神像，还有两段关于日月星辰运转与人事灾祸吉凶关系的文字，乃是宗教活动用品。西汉帛书所记几乎都是反映神学观念的

数术内容，如《五星占》、《杂占》之类。至于石刻文献，从秦始皇东巡所立的碑碣，到历代墓志墓表，更无一不是宗教礼俗活动的产物。现在可见的最早的大宗纸抄本文献，是本世纪初在敦煌经洞发现的隋唐五代写卷，其中绝大多数是佛教经卷，尤为佛藏宝库。可以说，一部古典文献史，同古代的宗教发展史密切相关，如果不对各个历史时代的宗教神学及其礼俗加以研究，许多古文献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就难以得到解释。

古文献内容的研究，更不能脱离传统宗教研究。《墨子·明鬼篇》说：

故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固）必先鬼神而后人也。……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灭绝，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有（又）恐后世子孙不能敬若（畏）以取祥（祥），故先王之书，圣人[之言]，一尺之帛，一篇之书数语鬼神之有也。

竹帛盘盂等古文献，其内容充满鬼神，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传统宗教不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有明确的宗教组织、宗教经典并由教士传教，它不是与其他宗教相抗衡的一个教派，而是一种贯穿于全民世界观、礼俗乃至国家制度的神灵崇拜。换言之，古人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某种宗教。在这种状况下，传统宗教不会形成专门的宗教经典，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古文献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

地涉及宗教问题和鬼神祭祀现象，因为在古人看来，这些问题就象吃饭穿衣一样不可须臾或缺。

传统的目录学把古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我们不妨由此入手作一些大略的分析。

经部文献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及其大量的解释、研究著作。其中《易》是古代占筮的卦画符号与占辞相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是反映天人关系的古代数术书。《诗》中的《雅》、《颂》和《风》的一部分则是祭神活动的祝祷辞和乐歌。《礼》的内容大多是宗教政治礼仪的规范，集中保存了大量的宗教礼俗制度。《乐》的内容自古都被视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是从功能的角度强调礼乐不仅仅是宗教的仪式，它恰恰表明礼乐在形式上是属于宗教的，是儒家把礼乐由从属于宗教改造为服务于政治的表现。至于《书》和《春秋》（及《春秋三传》）从内容上说本应属于“史”的。

史部文献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评述。在古代社会中，既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记载国事的史的内容，当然也以“祀”与“戎”为主了，以致翻开史书，几乎没有一件大事不涉及宗教观念或其礼仪的。姑且不说史书中的《礼乐志》、《郊祀志》之类所记的主要是宗教制度，它实际上就是礼经在各个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充满史书的姓氏、庙号、谥号、宗法等，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宗教的观念和制度。各种政治、军事、外交、天文历法、时令节候等活动，也往往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巡守、封禅、即位、丧葬、献俘馘、盟誓、告朔、迎气之类。其实，上古史官本来就

来源于巫、祝、卜等神职。在《周礼》反映的周代职官系统中，史官隶属于春官大宗伯(最高宗教神职)。其长官为太史，除负责法典、契约、天文历法之外，还负责制诔谥、指导祭祀等宗教事务；副长官小史负责记大事、定世系、辨昭穆及王事忌讳，也多与宗教活动有关。属职有“冯相氏”和“保章氏”，掌天文历法、占候星相云气、观察妖祥吉凶等，实质上就是占测天人感应诸事。史书中的《五行志》、《符瑞志》之类，大约就是根据他们的记录而整理出来的。

子部文献很杂，除了数术、方技、释家、道家等主要是宗教文献以外，其他方面也掺杂大量宗教鬼神及其有关的思想哲学或礼仪民俗。有些子部著作从思想上看是主张无神论的，甚至充满着对宗教迷信的批判精神，如《荀子》、《晏子春秋》、《论衡》等，但如果研究者对书中所批判或涉及的各种神学观念及宗教礼俗不了解，也难以作深入的研究。

集部文献向来被视为文学作品(当然还包括许多思想家对文史的评论)。正如史部文献离不开宗教现象，文学既不能脱离社会，当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宗教现象。以楚辞为例，不仅象《离骚》、《天问》诸篇包含大量的远古神话传说，离不开对原始宗教和民俗的研究；有些作品如《九歌》等，本身就是楚俗祭祀神祇的歌辞，如《东皇太一》用于祭太一神(天帝)，《云中君》祭云神，《湘君》、《湘夫人》祭湘水神，《大司命》、《少司命》祭司命神(属天神)，《东君》祭日神，《河伯》祭黄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死难战士英魂，等等。有些文学作品，如描写祓禊、寒食、端午、七夕、重九、除夕、腊日、社日等的诗文，看起来说的是各种时令节日，

实际上这类节日正蕴涵着宗教意义的古俗。当然，不涉及宗教现象的作品也有不少，但这不影响我们从总体上看待古文献与古代宗教之间的关系。

为了配合古典文献研究，本书在阐述传统宗教时，除了结合考古、民族、民俗诸材料以外，尽可能多地结合古文献材料，包括出土的古文献如甲骨、金文、简帛书等。其中对商代宗教的论述，主要是根据殷墟甲骨文献，并参考传世文献如《尚书》、《商颂》、《史记·殷本纪》等。周代宗教的参考文献较丰富，除大量使用的《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及其注疏以外，还有先秦诸子、《诗》、《书》、《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等。秦汉宗教的主要参考文献是《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和《五行志》、《后汉书·礼仪志》和《祭祀志》，此外还有《春秋繁露》、《白虎通》、《论衡》等汉代子书以及出土的秦汉简帛书之类。魏晋以后的传统宗教主要参考历代《祭祀志》及散见于《通典》、《通志》、《会要》、《太平御览》等书的资料，但不是本书重点。为了溯源探本，原始社会(夏代以前)的宗教，本书作了较多的探讨，主要依据只能是考古发现的遗迹，同时参考了保存在甲骨文及先秦两汉文献如《山海经》、《楚辞》、《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五帝本纪》及其他经史中的神话传说、逸闻逸事。值得一提的是，汉唐经学家对经籍的注疏中保存了许多古书佚文，也对宗教方面的制度多有涉及，这些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由于笔者阅读面的限制，必然还有很多重要材料未能参考征引，这只能以后弥补了。

从事传统宗教研究的初衷，原是为了古典文献研究，所以在

撰写时，除了注重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外，还特别注重各类概念在文献中的写法，并以文字训诂学为手段，探讨这些概念的得名缘由、具体意义及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如上帝的名称，古书中有“天”、“昊天”、“皇天”、“帝”、“上帝”、“天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皇帝”等不同提法，战国以后的文献中又出现“天皇大帝”、“玉皇大帝”、“北辰耀魄宝”、“太一”（或作“泰一”、“太乙”）、“紫微帝”等名称。这些名称是怎么产生的？它们的真实涵义是否完全相同？又如同是鬼神，有“鬼”、“神”、“精”、“灵”、“魂”、“魄”等不同提法；同是神主，商代称“示”，周代称“主”；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凡如此类问题，本书都试图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于甲骨金文等出土的古文献，其中许多文字的考释还没有定论，有的则一直流传并不可靠的说法，势必妨碍对文献的理解。对这些问题，本书虽不可能一一作专门的考证，但也尽量利用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原理作一些简单的论述。这样做不免涉及一些文字训诂学方面的术语，对于不打算接触古文献材料的读者来说，也许略显繁冗了一些，但对于想刨根究底的读者，也许是有益的。

书中对古文献的征引，凡用（ ）号者表示引者的注文，用〔 〕号者有的是补足原文的阙文，个别情况下是为了帮助理解而补的被省略的文字（如主语、虚词）。为免繁琐，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有时引文中删除了无关的词句而未加省略号。引文出处，凡甲骨著录用简称，原称可查附录。在行文中，有时涉及的概念虽然比较陌生或难懂，但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已作过阐述，通常不一一注释，只作*号表示在本书中已经述及。

序

宗教和神话，是古代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非现代人所能想象。中国传统宗教源流久远，可以佛教的传入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在受佛教思想影响之前，自上古三代以至秦汉，宗教崇拜有其一贯的发展脉络，后人在好多方面已不熟悉。但是要追溯传统宗教的渊源，就必须去考察那个时代。

以有文献可征的周代来说，有关宗教崇拜的制度多保存于礼书。而古人所谓礼，与后世礼的观念范围有广狭之不同。《周礼》云：“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其所司五礼之首吉礼，即指“事邦国之鬼、神、示”，包括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的祭典，还有对先王的享祀，内涵颇为复杂。礼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如果忽略了其中的宗教崇拜及有关的思想观念，于传统文化便不能有全面的理解。

把目光从文献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来，也不难看到研究古代宗教的必要。考古发掘的很多古代文化遗存，皆和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宗庙、明堂之类建筑和发掘中最常

遇到的墓葬等现象，离开宗教的观念很难解释。古文字材料，如商代及西周的甲骨文，极为学术界所重视，考释研究的论作数以千计，然而不少人忘记了甲骨本是占卜的遗留，而占卜作为一种数术，更是同那时的信仰分不开的。金文也是一样，具有铭文的青铜器大多是用于祭享的礼器，随后又依照葬俗殉于墓内，亦为宗教信仰的反映。不妨说，卜辞金文总是蕴涵着礼制和信仰观念，有待大家去剖析。可惜国内学者，除少数几位外，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探究的，实在是太少了。

最近，英国专门研究古代信仰的学者詹姆斯·弗雷泽的名著《金枝》(一卷本)中译本终于出版。记得五十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借阅该书，看过一卷本，也翻过十二卷本，对作者征引之广博、论究之深邃殊为惊叹。后来读到郑振铎先生《汤祷篇》一书序言，他讲到希望译出《金枝》，也曾发愿试译其一卷本。我至今以为郑先生说得对，而且，我还认为，象《金枝》这样规模和性质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的领域内也应该进行。假如弗雷泽能充分通晓中国的大量材料，《金枝》的面貌或许又会有一番改观罢？

这样说，并非主张把中国古代宗教、神话的研究简单纳入《金枝》的体系之中。弗雷泽的著作一开始即以古罗马的传说为导引，他关于交感巫术等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以欧洲文化为依据的。中国古代文化有其另外的起源和传统，其传说、信仰也有自己的特色。以我国古代长期流行的“数术”这一名词为例，在西方语言中似乎就不容易找到适当词汇来表达。研究中国传统宗教及其思想，有可能揭示出一些独特的观念和原则，从而使人们对人类早期文化的发展有更多的认识。

在这方面，詹鄞鑫同志的这部《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称得起是开创性的作品。书中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将《周礼》所述神、鬼、示都包括在内。所引据的材料，既有传世文献，又有考古和古文字学成果，同时吸收了前人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许多学科的见解，熔为一炉。由于鄞鑫同志本人原侧重于古文字研究，书中对甲骨、金文提出不少新颖看法，也为本书生色。相信从事有关研究的各方面学者，都能由本书获有启发；一般有意于了解古代传统文化的读者，也一定会对此书产生浓厚的兴趣。

关于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这类问题的探讨，有时容易陷于蹈空，多推想而少确证。鄞鑫同志这本书却能力求朴实，言必有据。正因为如此，此书虽然篇幅不长，已为今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相信不久的将来，鄞鑫同志会做出更多的成绩。

李学勤

1988年5月16日于北京昌运宫